

中国与周边及 “9·11”后的 国际局势

李玉 陆庭恩 主编

ZHONGGUO
YU ZHOUBIAN
JJIUUYIYI HOU
DE GUOJIJUSH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00
F31
184
45

中国与周边 及“9·11” 后的国际局势

李 玉
陆庭恩
主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二〇〇三年一月十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与周边及“9·11”后的国际局势/李玉, 陆庭恩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7
ISBN 7-5004-3445-6

I. 中… II. ①李…②陆… III. ①中外关系—研究②国际
政治关系—研究—亚非拉国家 IV. ①D822 ②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1548 号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875

插 页 2

字 数 346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韦 民	李 玉	李寒梅
李安山	陆庭恩	陈建民
尚会鹏	杨保筠	钱雪梅

前 言

中国是世界上接邻国家数目最多的国家。而与周边国家在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和睦相处,建立一个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不仅有利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也有利于维护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因此,“睦邻友好”一直是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断向多领域、深层次的方向发展,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中国和周边国家的人民也从中受益匪浅。当然,毋庸讳言,中国在与周边国家交往中也有过不甚和谐的时候,但这毕竟只是中国对外交往历史长河的支流旁系。为了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近年来利用自身的优势,加强了对周边国家的研究,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列入重点研究课题,并通过各种方式深入地开展研究。为了交流研究的成果和推进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亚非研究所于2000年5月,邀请在京部分专家学者,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就中国与主要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并展开讨论。会后,成立了编委会,将与会者的论文收集到一起,开始操作论文集的出版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工作一直延缓下来,直到2001年8月才大体告一段落。正当书稿付梓之际,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事件。这次事件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大国关系、国际合作、联合国的作用、安全观念、经济全球化趋势等方面出现或将出现许多

变化。尽管它的影响和产生的变化,难于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全部表现出来,但编委会认为对于这样一次重大事件,书中应该有所反映。为此,亚非研究所于2002年1月8日举行了题为“亚非地区:‘9·11’的冲击与影响”的学术讨论会,与会的从事亚非地区研究的专家学者对“9·11”事件后中亚、中东、南亚、东亚、东南亚和非洲地区的新局势进行了讨论。会后,编委会从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中遴选出若干,与原来的论文汇编成此书。

“9·11”后,中国外交上的“睦邻友好”政策没有变。在世界越来越趋于单极化的今天,中国有理由更加担心自己国家的安全和世界和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显得更为重要。从国内来看,随着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更为艰巨的阶段,这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所以,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的选择不仅没有必要改变,而且应当进一步加强。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有经验也有教训,需要回顾历史也需要展望未来,需要精细的对策研究也需要宏观的战略把握。这就是编辑、出版本论文集的宗旨。

在此,需要说明三点:(1)本论文集是作为《亚非研究特辑》而出版的。《亚非研究》是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不定期综合性学术论文集,主要刊登亚非地区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等现状和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自1991年以来已出版8辑。(2)本论文集是以各篇论文的内容为据而排序的。(3)从学术讨论自由、尊重作者观点考虑,对作者的学术观点编委会不作任何改动,实行文责自负的原则。各篇论文的观点只是作者个人所见。

本论文集的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及提供论文各位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与关怀,在此一并深表感谢!

限于水平,定有不少疏漏与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本书编委会
2002年4月2日

目 录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 50 年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马志学 (1)
东北亚安全结构中的中日关系·····	刘金质 (22)
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与日本的政策取向·····	王春生 韦 民 (40)
以史为鉴, 消弭隔阂, 开拓未来	
——中日摩擦浅析·····	贾蕙萱 (56)
中国同朝鲜半岛国家关系·····	金 哲 (71)
世纪之交: 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回眸与展望·····	杨保筠 (94)
21 世纪的东盟海洋战略·····	孙纯达 (121)
金融危机后东盟的新动向·····	张训常 (131)
中越经贸关系发展的十年·····	利 国 (140)
中国对南亚政策及与南亚主要国家关系的演变·····	尚会鹏 (150)
中印关系的改善和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张敏秋 (175)
21 世纪中印关系展望·····	孙士海 (196)
美国对印度政策的调整与中印关系·····	林良光 (213)
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 回眸与前瞻·····	邓 浩 (228)
谈我国对中亚五国的外交政策·····	张振国 (243)
发展与思考: 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	
的回顾和展望·····	陈建民 (257)
帕西地区的风云变幻与中国—帕西关系·····	安维华 (273)
“瓦哈比派”辨·····	金宜久 (288)

全球化与中东现代化进程

- 兼议沙特阿拉伯现代化面临的挑战 马志学 (303)
- 中国少数民族国际迁移的原因及外部因素浅析 ... 李安山 (314)
- “9·11”事件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 王锁劳 (339)
- “9·11”事件对美俄争夺中亚态势
的影响 张振国 廖其年 (354)
- “9·11”事件后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新发展 杨保筠 (366)
- “9·11”事件后的日本外交危机管理研究 初晓波 (381)
- 日本的政策制定过程与“反恐怖法案”的通过 ... 韦 民 (404)
- “9·11”事件后的美国与非洲 陆庭恩 (425)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 50 年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生存发展环境。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在我国外交战略中应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50 年里，我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周边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年轻的共和国需要广交朋友，走入国际社会，争取与世界各国普遍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展友好交往。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尽快与我们的周边四邻建立友好睦邻关系，使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能有一个和平、安宁的外部环境。在最初的年代，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这三个周边国家较快达成了建交协议。通过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们与苏联这个最大的周边国家建立了明确的全盟关系，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将这种特殊的政治关系延伸到一系列东欧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直接参与了冷战时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形成过程。从当时来看，中国置身于社会主义阵营，对

于减少来自外部敌对势力的威胁和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无疑具有积极作用。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的这种“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曾经一度引起那些周边民族主义国家的疑虑和戒心。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美国的恶意宣传和挑唆所致。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国军事力量进入台湾海峡地区，使我们年轻的共和国面临严重的军事压力。长达三年之久的抗美援朝战争，迫使我们在国力还很薄弱的情况下不得不给予国防很大投入，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拉了国家经济建设的后腿。此外，由于美国孤立中国政策的影响，除了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外，我们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活动空间还十分有限，有时还不得不通过第三国向西方国家传达我们的政治信息。美国直接卷入朝鲜战争后，形势的突变使中国的东北地区面临严重军事威胁，周恩来总理曾经通过印度政府向美国表明了我们的严正立场。

二、四次国际会议：20世纪五六十年代周边外交的精彩之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没有太多的机会参加各种国际会议，这和今天无法相比。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充分利用了有限的机会，仍然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有所作为，下面谈到的四次国际会议，都可以看做是我们当年周边外交所取得的重要成就。

（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这是第一次在新中国举行的重要国际会议，尽管它属于一种民间外交范畴的非官方国际会议，但在50年代初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仍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当时美国加紧对日本的控

制，破坏朝鲜停战谈判，在亚太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几十年来饱尝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积极支持战后蓬勃兴起的世界和平运动。这是中国为改善自己的周边国际环境、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争取赢得更多国际支持而作出的一次重大努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次会议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外交这样一种特殊的外交方式。此后，这样一种非官方的外交渠道，在中国遭受制裁、禁运和孤立的非常年代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例如在中日正式建立邦交之前，这种通过双方各界人士直接交往的民间外交方式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显示出民间外交的巨大生命力。

（二）1954 年的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国际会议和 1961 年老挝问题日内瓦国际会议

两次日内瓦会议都是讨论有关中国周边国家问题的正式国际会议。在五六十年的那个特定历史时期，这是中国参加过的绝无仅有的两次东西方阵营同台对垒的国际会议。^① 当时朝鲜半岛虽然初步实现了和平，但同属中国周边地区的印度支那半岛仍然处在多事之秋，两次日内瓦会议就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召开的。前者是新中国第一次全面参与的重要国际外交活动，尽管当时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仍然被蒋介石集团窃居，但由于中国为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中国作为亚洲大国的政治角色在这次会议中得以凸现。亚洲是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阵地，也是冷战中双方争夺的重要目标，故而这个时期中国的周边国家外交也难以脱离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垒的背景，不可避免地要打上冷战时代的烙印。1961 年，老挝内战的国际

^① 在此之前，中国曾经参加了有关朝鲜问题的第一阶段的日内瓦会议，但会议没有取得任何具体成果，最后不欢而散。

化，再一次把中国推向了国际政治斗争舞台的前沿。经过与美国为主要对手的艰苦谈判，会议达成了协议。尽管此协议不久后就成了一纸空文，但这次会议的政治意义还是不能低估的。与 50 年代举行印度支那问题国际会议的时期相比，我们的国力和国际地位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我们的外交活动空间和外交斗争的水平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提高，而且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这次日内瓦会议更多地表现出了中国外交的独立性和自己的鲜明风格。

（三）1955 年的万隆会议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己召开的大型国际会议，它对推动亚非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建立新型的发展中国家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从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角度看，万隆会议也是一次摆脱西方国家操纵、消除西方诋毁中国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以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机遇。会议内外曾经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会议之前发生了将周恩来总理作为恐怖行动目标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凡此种种，都反映出这是一场复杂艰巨的国际政治斗争。它让世人看到，当时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反动势力是何等惧怕亚非国家的历史性聚会，他们惟恐中国人民的正义之声在会议传播，担心中国将借这次会议冲破他们在中国周边地区设置的政治包围圈。万隆会议的成功举行告诉我们：只有坚决走出国门，广交朋友，才能极大地拓展我们的外交活动空间，才能为自己创造一个有利的周边国际环境。后来我们与邻国锡兰（即现在的斯里兰卡）之所以能够建立外交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万隆会议促进了双方之间的了解和信任。锡兰领导人顶住美国的强大压力，冲破西方世界对我们实行的禁运，毅然决然地向我国出口了当时亟需的战略物资——橡胶，这是我们周边外交的一个成功范例。

老一辈政治家、外交家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赢得了众多朋友

和尊重，他提出的“求同存异”这一闪烁着政治智慧光芒的名言，为新中国的和平外交开创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周恩来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的气质风度和人格魅力，也为中国外交工作树立了万世楷模，与日月同辉。

三、中国与几个周边国家之间关系发展历程的回顾

（一）中国与前苏联：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苏关系的主导因素是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一边倒”曾经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对苏关系的形象化概括，尽管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但不可否认，这种失去了平衡的外交战略从长远看终究是弊大于利。尽管过去一度认为，中苏关系破裂完全是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分歧所致，但实际上双方各自不同的国家利益和民族矛盾才是更深层的原因，现在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历史证明，只有当这种意识形态分歧深深地触及到国家利益和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时，理论观点引起的争执才会演变为国家关系的每况愈下。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与苏联在政治上彻底分道扬镳，从60年代中期直至80年代，尽管双方还勉强维持着外交关系，而实际上彼此已然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两国之间的敌对程度似乎超过了他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发生了珍宝岛事件这样的边界局部战争，苏联甚至还曾经企图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核攻击。凡此种种现象，倘若仅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分歧这一角度去分析其原因，那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的。1991年，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发生巨变，原来的苏维埃联盟制国家解体。之后，我们在总结这个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承认了苏联解体前国家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就等于否定了过去我们加

在苏联身上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等“罪名”。历史似乎开了一个玩笑，在改革开放大潮席卷中国的今天，回忆这些往事，真让人感慨万分。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后来勃列日涅夫，他们在处理苏中两国的国家关系时，都的确表现出严重的大国霸权主义倾向，在他们身后留下来一连串外交劣迹，这一切也都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总而言之，国家利益，民族意识的对立才是中苏两国关系恶化的最根本原因。

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在国家利益、民族心理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和矛盾，我们在制定相关外交政策和处理相互关系时必须正视这个基本事实。政治哲学、思想意识的一致，终究不能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党际交流、交往必须与处理国家关系严格区分开来，不能相互混淆，执政党之间的良好关系当然有助于密切两国关系，但从根本上讲，要想使国家关系长期地保持稳定并能得到健康的发展，那就只能以普遍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这样就不会因为党际关系的变化或者对方国内政局的变化而影响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否则的话，只能会使国家关系更加复杂化，以往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太多了。

（二）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俄罗斯：当代新型的国家关系

中国与北方这个最大的邻居之间，50年来可以说经历了曲折漫长的“悲欢离合”过程。两国关系近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建立了现在被称之为的“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这种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它与过去提出的要与美国建立的那种战略伙伴关系有什么不同？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中美俄（中美苏）三大国之间的互动关系，50年来几次出现战略性调整。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原苏联的主体俄罗斯的国家实力较之前苏联时期大为下降。相比之下，美国

则一下子成了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大有一览众山小之势。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知识经济的异军突起，又给占得先机的美国经济注入了强心剂，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使美国的国家实力大增。在这种背景下，洋洋自得的美国政治家们在国际事务中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地球霸主姿态。处于这种新形势下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之中的中国，经过不断的磨合，现在与前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全面、有序和健康发展的历史新时期，这不仅对改善我们的周边政治环境，促进亚洲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大有裨益，而且也有助于我国对抗当今世界的霸权主义逆流。

（三）独特的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关系不时受到来自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和历史纠葛等种种负面因素的影响、干扰，这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又有愈演愈烈之势。如果说在中国贸易领域出现纠葛尚属正常现象的话，那么在篡改中学历史教科书、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慰安妇赔偿和日本政府对待刘连仁诉讼案判决结果的恶劣态度等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确可以让人明显地感到中日两国之间的裂痕愈来愈大。如何应对这一系列复杂矛盾，使中日关系朝着稳定、成熟的方向发展，这是我们今后面对的一个艰难课题。尽管如此，笔者仍然认为，全面地看，比起中国与美国的复杂互动关系，应该承认，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障碍毕竟还是要少一些^①，而中日之间在经济层面上的互利互补关系则十分明显且十分重要。日本

^① 例如，台湾问题一直在不时地干扰中美关系，而台湾因素在当前中日关系中还尚没有那么大的负面影响，虽然总有那么一些日本政治家在对台湾想入非非，有时候也搞些“小动作”。

近年来一直在不间断地扩充军备，是否据此就认为日本是在妄图重温军国主义旧梦、处心积虑地要搞对外军事扩张？做这样的判断恐怕还要慎重。70年代初，我们有人曾经轻言日本正在复活军国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这一判断显然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尽管近年来日本的军费开支一直保持相当高的水平，其绝对数额早已大大超过了中国，但日本的军事力量毕竟仍然受到日本和平宪法中有关条款的约束，对中国尚未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当然，我们对此的确不能掉以轻心。笔者比较倾向于这种观点：“目前日本扩充军备，与其说是为了备战，不如说是为了利用军事力量的威慑效应。在当今世界，军事力量不仅仅体现在战争中，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存在可以影响政治进程和周边国家的民族心理。对日本来说，军事力量不仅是综合国力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向‘普通国家’过渡的一种积累。”^① 这里所谓的“普通国家”，其含义就是要成为一个与其他世界大国平起平坐的国家。换言之，日本一些政治家自认为他们的国家现在仍然处于一种“低人一等”的不正常的国际地位，感到自己是一个经济上的大国和政治上的小国，这使得这些人的心理难以平衡。日本之所以积极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这样一种心理。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日本国内出现的政治右翼化倾向和相应的外交动态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小泉的当选及其所代表的日本民族主义新思潮的涌动，是一种远比出现几个石原慎太郎那样的跳梁小丑更为深刻、复杂的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对此我们很多人似乎思想准备不足。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于用类似“政治上的一小撮”这样的观念和思维模式来看待、分析日本出现的种种负面因素，而对日本民族特性及其在现实中的发展变化缺乏足够的认

^① 庞观：“给日本号脉”，《参考消息》2001年5月10日。

识了解，更谈不上对其进行一番深入细致的研究。今后，我们是不是能够对日本社会各阶层的舆论倾向多做一些深入的考察和调研工作呢？我们不能总是把目光只盯在那些政客身上（当然这是必要的）。

目前中日两国实际上都在互相关注对方的发展动向。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日本朝野各界对当代中国的看法。比如，日本方面2000年曾经对他们所说的“中国的海军舰艇和海洋调查船在日本近海频繁活动”表示“严重关切”，日本自民党内因此而传出一种“强烈意见”，声称要对此表明“日本的担忧”，甚至提出“现在不应该对中国实施特别日元贷款”；^①又比如，有人说：“自明治以来，日本的外交一直在为如何与中国建立关系而苦恼。在当今世界，与中国的关系除了谋求共存共荣以外，别无选择。冷静地思考日本的国家利益，稳定并加强日中关系是可能的。对华援助就是重要的手段之一。”^②这些言论表露出当代日本政治家和学者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的一种复杂、暧昧的心态。

我们在强调必须尊重历史、反对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同时，也要看到，毕竟人类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赖以滋生、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已然大大改变。对两国关系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那样的分歧、矛盾和逆流，我们既要保持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清醒的头脑，正视它们的存在，不回避矛盾，不粉饰太平；又不要以偏概全、过度渲染，甚至人为地扩大中日矛盾。最重要的是要着眼于大局，以积极的态度推动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正常交往与合作，尽一切努力使中日关系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我想，这才是处理中日关系的一种恰当

① 《日本经济新闻》，2000年8月9日。

② 日本驻华大使馆公使宫本雄二的文章，见《参考消息》2000年8月8—10日。